

不问风月 只谈家国

——黎烈文与《申报·自由谈》

晁 映

在中国现代报刊史上，曾有这样一位青年才俊，未及而立之年即主持旧中国历史最为久远的《申报》之副刊《自由谈》，发表了包括鲁迅等许多革命作家、进步作家的作品；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又主办了进步刊物《中流》，寓国难当头之际作中流砥柱之意，鲁迅先生遗嘱亦在此发表；30年代后期，又参与抗战文艺刊物《呐喊》和《烽火》的编辑工作，为抗战到底鼓与呼。这位杰出的报人，就是中国新闻史乃至文化史上颇多建树，却又身后声名不显的前驱者之一的黎烈文先生。

黎烈文1904年5月18日诞生于湘潭县城小东门的仿陶别墅，出生之时家道中落，初中毕业才满15岁就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了书记员。1926年初夏赴日留学，年后负笈法国。1931年夏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翌年春回国。

《申报》副刊《自由谈》创刊于民国初年，素以鸳鸯蝴蝶派把持，所刊作品皆为“奇闻轶事猎奇”及茶余酒后消遣

等逢迎小市民口味的作品。1932年12月1日，黎烈文接编第一天就在报上郑重宣布：“到昨天为止，这台上演演的，已告一段落了，闭幕了。从今天起，新的活动开始，幕又要重新开了，其中有什么？这里也不多谈。瞧着吧。”

黎烈文认为，世界一切都在变化、变革，《自由谈》应适应时代潮流，立足进步和近代化，不要离大众太远。黎烈文将整个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连夫人严冰之临产也无暇照护。因产后发热，严冰之产子两周后便不治而亡。1933年1月24日，黎烈文在“自由谈”上登出《启事》道：“烈文最近遭遇不幸……现在内子丧葬粗了，烈文自即日起，照常到馆办事。惟思悲苦，难言奋斗，甚望海内贤达，时惠佳著，俾本刊内容，日益充实，岂惟本刊之幸，实亦为中国文化前途之幸也。”

鲁迅深为黎烈文的忘我事业心所感动，与茅盾一起为《自由谈》撰稿，支持这个有为的青年。一代文宗大师登高一呼，遂引得群山响应。瞿秋白、郁达夫、巴金、老舍等纷纷来稿，大量针

砭时弊的杂文横空出世，为阴云密布的上海滩打开了一个呼吸清新空气的窗口。左联青年也随之出动，使《自由谈》内容五光十色，绚丽多彩。内容偏重杂文、短评等民主、自由言论，引导广大市民关注社会事件，研究社会问题，一跃成为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茅盾在《多事而活跃的岁月》中说：“延续两年的《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当大书一笔。”

黎烈文主编《自由谈》计一年五个月零八天。在共同战斗的经历中，黎烈文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据《鲁迅日记》粗略统计，鲁迅写给黎烈文的信有78封之多，可见两人亲密程度之一斑。鲁迅逝世后，黎烈文为抬棺者之一。他还在《中流》上出了“哀悼鲁迅先生专号”，其中就有他自己写的《一个不倦的工作者》。文中号召大家“像鲁迅先生，抱定一个理想，一息不停地工作下去，黑暗势力的壁垒才有攻破的可能。”

抗战开始后，黎烈文追随鲁迅至交、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在福建从

事文化出版工作，为抗战宣传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黎烈文又追随陈仪去台湾，结束了他近十年的半政界生涯，由此人生轨迹也从绚烂归于平淡。

去台后，曾怀抱“政治改进”和“社会进步”理想的黎烈文，因受陈仪案件牵连，在政治上备受当局打压。但他在台湾生活26年，安于清贫，以教学和写作谋稻粱，不失文人风骨。1972年10月31日，黎烈文在台北去世，终年68岁，身后萧然。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黎烈文渐为后人淡忘甚至误解，甚至有人称其为“反动文人”。巴金先生仗义执言，为友人鸣不平，在《怀念黎烈文》一文中写道：“他并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遥远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别，但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应当是他的遗言吧。”巴老此言，也算还黎烈文先生一个清白了。

小说《胡眼镜》的创意

冰
静

阿良（徐秋良，湘潭作家）刊发在《湖南日报》副刊上的小说《胡眼镜》，写农技师胡建梁（人称胡眼镜）被县里派往云顶村任科技特派员。他找乡长、书记，自告奋勇帮患腰椎间盘突出突出的桃满爹，救治了禾苗白叶枯病，并为他育秧谷；还说服了桃满爹不让高中差一年毕业的儿子辍学打工，挣钱为母亲治病，且激励他必须考上“211”大学；又帮桃满爹流转了几亩土地，种上了玉米、香瓜。桃满爹老婆患肾病，她种的谷雨茶，经胡眼镜改造后，每年要多摘几斤茶叶。全乡八个村，水稻、蔬菜、茶园、水果，哪里出了毛病，只要胡眼镜开出方子，药到病除，飞灵！

就这么点好人好事，也值得作古正经说道吗？

我想起了文学写作的创意。有一天在路上，一个孩子指着天空说，那是一条狗。妈妈斥责说，蠢家伙，那是云。一个美妙的创意就这样被扼杀了。

有道是，创意是一场人生的修行。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特丽莎·阿马拜尔说，创意是能成功运作的新点子，创意是能创造新颖及适合题目的作品的能力。

《胡眼镜》这篇小说能触发我灵感的就是这么一桩平凡的叙事所揭示的哲理：“交往神的人，自己也会成仙。”却着实令人魂牵梦绕。这就是被称为创意的新点子。

谁是“神的人”？当然是这个农学院毕业，在乡政府一窝就是20多年的农技师，终于被选派任了科技特派员。他用对桃满爹一家伤残病痛的关注，一手扶贫济困，一手激励后代踔厉奋发，使桃满爹一家在国家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当下，也有资格来谈论共同富裕的问题；而共同富裕激活了我们开拓创新的勇气，共同奋斗才是我们的实践壮举。于是，这个胡眼镜在桃满爹眼里，简直就是无所不能的“神”；而胡眼镜的满腔热血和坚定信念，对于被拯救、被激励的桃满爹一家，其实就是沐浴在幸福的阳光里，漫步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的真正动力！老爹在流转土地上的玉米、香瓜丰收，老婆的谷雨茶闹市飘香，儿子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业有成，荣归故里，这样的家庭，应该就是现代农民命运的一个范例吧。

胡眼镜和桃满爹一家为代表的奋斗者的终极目的，就是乡村全面振兴，包括文明、文化、安全、生态等等，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创意的哲学思维，提升了文学作品的高度，让人似乎看见了诗和远方；如果还能显示出作品内在的张力，让人掂量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来，那就有了力度。文学作品需要积蓄力量。因为人的内心的强大、情感的丰富、胸襟的开阔、志向的历练等等，都需要力的积蓄和补充。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书本，也来自自然和生活，形成自然之力、生活之力、思维之力、语言之力。“交往神的人，自己也会成仙”，这种魅力的相融合，有如美食家的“借味”说，味与味相逢，鲜上加鲜而不失本味，既能滋养身心，又能丰满人生。而“借力者明，借智者宏，借势者成”，它所揭示的正是小说创意所蕴含的伟力所在。

板石巷与洗脚桥

田
园

一连数日大雨滂沱。我路过文庙，陡然想起年少时在城里头做苦力，无数次经过的板石巷和洗脚桥。久违的它们如今是什么模样？我手持雨伞，悠悠地走向它们。

板石巷在前，洗脚桥在后，我先去前者。板石巷只有几百米长，巷子深深且狭窄，其北起观湘门，南接城正街。板石巷旧时是交通要道，十分热闹，县衙各机关都在其附近。20世纪90年代，湘潭县政府迁走后，板石巷归于淡泊。

我从观湘门进入板石巷。巷子豆大的雨中格外宁静又格外苍老，以往喧嚣的景象荡然无存。巷子两边的房屋垂垂老矣，亦如我花白的两鬓，其青墙黑瓦在雨帘中顽强地展现着它暮年的羸弱。

板石巷，元明时称攀龙街。攀龙街旧时是富贵人家的居住地，规划六总。其名起源于元代一个叫甓理溥化的人中进士后，人们为他建的一个牌坊——攀龙坊。这条街就称作了攀龙街。甓理溥化生卒年月不详，字元溥，又曰玄圃，居湘潭，元至治二年（1322年）中进士，泰定四年（1327年），任舒城长，后以奉直大夫致仕归。可以想象，他当年刻苦攻读一定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

雨还在滂沱。我来到巷子中间的唐氏义门。明朝永乐八年，即公元1410年，湘潭知县奉旨在此建祠，明末毁，乾隆五十九年重建。1986年，

文物部门进行了修葺，基本保持了历史原貌。唐氏义门在雨中略显年轻，当年的风采依稀可见。其门坊以白红灰三色为主，高约五米，宽不到三米。石门两边有一联“恩周四县，籍隶五朝”，门上有“唐氏义门”四字，以红色为框。门上头还有三个白底红框，框内原有“福如东海，天官赐福，寿比南山”三幅人物画像，而今已消失殆尽。门坊顶部为青瓦，中间有只红蝙蝠石雕，两侧檐角形似乌龟，伴有祥云图案。明永乐二年，即1404年，湘潭、攸县、醴陵、衡阳四县遭受旱灾，城正街淦田唐氏率湘潭众族千余家捐谷米万石，赈济四县灾民。明成祖朱棣得知大为感动，大笔一挥御题“唐氏义门”，诏建坊旌表之。

英雄是有传承的，善亦如此。淦田唐氏传承了湘潭人的善，可谓善莫大焉。想到此，我亦心暖，如雨中太阳温暖着这小小的巷子。出得巷子，我的裤鞋已湿透。索性，我卷起裤脚，脱掉鞋子，光着脚在一凹凹的积水里行走，清脆的踏水声宛如儿时歌谣的欢快。

我走向洗脚桥，原址已是楼房林立。其实，至今我也没见过洗脚桥，只能去想象它的存在。传说明朝正德皇帝下江南，来此地小桥边休息，并下河洗脚，故以“洗脚桥”得名。又传铁拐李也到过此桥，下桥洗脚。皇帝和神仙到此观桥洗脚，洗脚桥的名

声应远播天涯海角。可惜的是，它不仅寂寂无闻，连影子也没有了。大雨滂沱，像无言的申诉。

此刻，我想象我就是洗脚桥，桥下河水清且涟漪流向湘江，河岸杨柳

成行，柳梢头上月影婆娑。桥是麻石砌成的，麻石栏杆雕刻有奇珍异兽，桥上亦有青年男女谈情说爱。

雨还在下，依旧滂沱。

